

把照金精神传承好发扬好

□丁德科

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首创精神，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为“一苏大会”），宣布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瑞金成为共和国的摇篮。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是当时全国最大、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一块苏区，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治国理政试验田。

最精干的中央政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工农民主政权

1931年11月7日，瑞金叶坪，樟桂飘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一苏大会”在这里隆重开幕了。这是中国革命史上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苏区的工农劳苦大众从此真正开始翻身做主人，参与国家政权的管理。在这面鲜艳的旗帜下，全中国劳苦大众的革命斗志无不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们从中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和希望。

“一苏大会”期间，代表们听取了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听取并讨论了项英、张鼎丞、朱德、周以栗、王稼祥、邓广仁等人分别作的劳动法问题、土地法问题、红军问题、经济政策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工农检察问题报告；通过了相关法律和红军问题、经济政策等决议案；最后选举产生了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我们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和基石。它的建立，进一步加强了苏区建设，扩大了党和红色政权的影响，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新局面，也为我们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建设以及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历史经验。

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建政经验、重建壮大了主力红军，积累了斗争经验，熔铸而成伟大革命精神。

照金精神的内涵

信念坚定、爱国为民。“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这是刘志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坚定的表达。李子洲在狱中坚贞不屈，审问他“信仰什么主义？”他斩钉截铁地回答：“信仰列宁主义。”谢子长在入党宣誓时激动地说：“我把一切都交给党了，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习仲勋13岁加入共青团，决心“要跟着共产党干到底”。坚定的政治情操，是信念坚定、爱国为民的本质所在。刘志丹“最感人的地方，是他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坚定信念，以及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王泰吉忠诚于党，在敌人屠刀面前大义凛然：“这头颅任你割断，这肉体任你践踏，一切听自然。”李妙斋立下“不推翻这个贫富不公的世道我誓不还家”的誓言。革命者始终把人民群众的事放在心上！红军南下突围返回途中，冒险截获渭河敌船，将缴获的面粉分给贫苦群众。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开办亭子沟集市，移风易俗，建立革命新秩序。勇于斗争，更显共产党人爱国为民的奉献精神与坚定信念。为了维护红二十六军团团结统一，刘志丹带领部队南下。1933年8月中旬的陈家坡会议，多数人的意见成为会议决策，即统一领导指挥来到照金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武装力量，保卫根据地，准备进行战略转移并进一步开辟扩大根据地。正确的重大决策，切实扭转了革命斗争危局。

独立自主、凝聚共识。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实际相结合。根据客观实际认真负责、决策，面对问题困难周细思考、处置。这体现了陕甘共产党人忠诚担当的原则方法。“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计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这是对陕甘共产党人切实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的鲜明特征的简约阐述。照金革命根据地以至陕甘革命根据地斗争中，党组织把革命斗争的重点始终放在农村，贯彻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很坚决。党组织把主力及时转移农村，主要党员到农村去、到兵营去，发动和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总是先进行群众工作，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工作。以先进思想引领，凝聚共识，统一意志，共同前进。到人民群众中做宣传教育工作。革命的教育与引领，也渗透在亲情和平时生活中。

求真务实、联系群众。陕甘共产党人坚持“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体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本质要求，也就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精神实质。“紧紧依靠群众”。刘志丹是这样说的，照金革命根据地斗争中也是这样做的。独立自主的基础是群众基础，农民群众是大多数。陕甘边区特委、革委会，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深得群众信任和支持，红二十六军有了个稳定的根据地。“这就是陕北的马克思主义。”周恩来高度评价陈家坡会议的作用与陕甘游击战争战术原则。“你们根据实际情况，打小仗不打大仗，积小胜为大胜。

这就很好啊！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就推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不和强大的敌人硬拼，发展起来了。”求真务实、联系群众，是照金革命根据地斗争所表现的突出特征。

百折不挠、快乐奋斗。把握方向，坚定从容。能够深刻总结“最根本的原因”，是革命者坚持英勇斗争的内在动力所在。刘志丹谈到如何对待兵变斗争时讲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革命者重要的是具有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能力，从而坚定从容地思考和把握革命斗争方向。具有先进思想指导的奋斗者必然表现出超然的英勇和乐观。群众拥护，血肉相连。山村大嫂说：“红军打仗流血又是为了谁？咱这山里人，可知道谁是穷百姓的好人啊！”革命者的奋斗，是为人民利益的奋斗。如此奋斗的胜利，快乐永恒。

照金精神的实质

照金精神生动传承了中华人文精神“民本”“为公”的价值取向、“自强”“维新”的修为特征、辩证会通的思维品质、厚德善为的行为风格。照金精神集中而生动地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素养。首先，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信仰与实现理想的坚定信念。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心悦诚服，对共产主义充满向往，并从内心作为信仰。爱国为民是其至上的宗旨信念追求，在艰苦卓绝斗争的生死考验中愈益坚定。其次，体现了共产党人政治上的坚定和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独立自主、凝聚共识，其根本点在于通过革命教育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在于共产党人坚持人民群众立场，在于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价值观。政治的坚定性，表现为对党和人民事业忠诚担当；斗争的坚定性，体现为处理问题的独立自主决策，表现了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与方法遵循。再次，体现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和知行合一的科学品质。创建军队、创建苏维埃政权基础上的根据地，源于对游击战争的正确认识，源于对创建苏区和根据地斗争道路的切实抉择，源于对革命斗争形势与发展的辩证分析、趋势预见。其出发点，是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其理念，是求真务实决策、和群众一起斗争；其根源，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思维的深刻掌握、正确运用，这生动反映了共产党人理论上的坚定与清醒。最后，体现了共产党人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乐观的处事风格。百折不挠、乐观奋斗，充分展示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共产党人身上所绽放的力量。照金精神与众多革命精神及其红色思想文化资源一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之树的生长繁荣。提供了源头活水，是党员干部加强马克思主义素养学习培育的重要学习教育资源。

照金精神在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得到传承和丰富，成为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的：“当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能够在照金落脚，就是因为群众基础好，他们能够密切联系群众，这里的群众能够支持革命，现在我们要依靠群众，要把照金精神传承好、发扬好，如果能做到这些话，我们的事业就固若金汤了。”

（摘自《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原题《照金精神：工农武装割据实践探索的人文精神华章》）

瑞金：我党最初的治国理政试验田

□陈安刘辉

活跃和发展经济：党领导的一项开创性事业

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苏区军民开创性地发展农业、工业、对外贸易和合作社经济，提出保护私人经济、“建立完全的厂长负责制”等举措，努力打破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与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域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

苏区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中头等重要的任务。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不仅保障了苏区群众的基本生活，也为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

党和苏维埃政府克服种种困难，创办和发展自己的工业。苏区工业生产，主要是手工业生产。苏维埃政府在鼓励发展个体手工业生产的同时，也加强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此外，苏区还开办了一些小规模煤、铁、硫磺等采矿场，办有中央印刷厂、中华商业公司造纸厂、瑞金纺织厂、于都通讯材料厂等。苏区工业的初步兴起，为打破敌人“围剿”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同时也为党和政府领导工业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

苏维埃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开展同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贸易往来，设置了对外贸易机构，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此外，苏区的财政、

彭真：城市规划考虑长远

□郑学伟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首任市委书记彭真（1951年2月起兼任市长）直接领导了北京解放后17年的城市建设。1956年10月，彭真在北京市委常委会上谈北京城市规划时，对首都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可行的意见，其中蕴含的思想方法值得我们学习。

关于人口规模，彭真认为，城市人口近期发展到500万人左右，将来全市要发展到一千万人。今天的计划要考虑到今后发展的需要。关于道路宽窄，他提出：将来的问题是马路太窄，而不是太宽。我们不要只看到现在北京全市只有不到一万辆小汽车，要设想将来有了几十万辆、上百万辆汽车时是什么样子的。道路窄了，汽车一个钟头才走十来公里，岂不是很大的浪费？

彭真还把修建停车场的问题，也当作一件重要事情郑重地提出来。他说，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北京如果有了几十万、上百万辆汽车，怎么放？他认为要充分考虑到，免得以后汽车多了被动。关于城市绿化，彭真提出：城市内应先划定各区公园分布网，划定后即公布，以免今后陷于被动。居民楼前面靠马路的地方可以留出一些空地搞绿化。工厂区内亦须留出充分空地建立园林，以调剂环境。

郑振铎回收故宫文物

□姜炳炎

新中国刚成立，作为首任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为回收故宫博物院文物做出了卓越贡献。

1949年11月刚组建文物局，郑振铎即参加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华东工作团，担任文教组长。他最关注的是尽快运回当年因抗战爆发南迁到南京的万余箱故宫瑰宝，经过不懈努力，第一批1500箱文物于1950年1月运回紫禁城，后又运回两批。

郑振铎念念不忘收回流失海外的祖国珍贵文物。1951年底，他出访国外，途经香港，得知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即将出售，他急告国内速报周恩来总理批准购回。回国后他立即筹备在香港设立文物收购小组，当时，新中国刚成立，缺少外汇。周总理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在香港用外币购文物，但只能是少而精。这个文物小组所购多为珍稀国宝，包括唐代韩偓《五牛图》、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等，全部上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当时计划部门有不同意见，认为人口规模过大，居住区用地定额偏高，规划的道路偏宽，绿地河湖水面面积也偏大。对于这种意见，彭真说，城市规划要有长远考虑，要看到社会主义的远景，要给后人留下发展的余地，不要只看到眼前。城市规划如果不考虑远景，终究是要挨骂的。在讲这些话时，北京因为汽车少，马路显得空荡荡的，有人就将马路修宽些的主张称之为“大马路主义”。彭真回应：“一九五三年提出东单至西单的大街宽九十公尺，就有人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大马路主义就是大马路主义吧。不要害怕，要看是否符合发展的需要。”

从1953年《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到1957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的研究编制，彭真都参与其中。许多重大问题都是由他主持研究，提出看法，经市委市政府讨论通过，再报中央批准。就这样，在当初具体描绘首都建设宏伟蓝图时，彭真坚持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发展的宽松空间。（摘自2018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郑振铎回收故宫文物

1952年8月，由郑振铎提议，经政务院批准，文化部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凡在各地“三反”“五反”运动中发现的故宫文物，其已判决没收和已由当地政府收回的，均应上缴故宫博物院集中保管。仅仅是东北博物馆（今辽宁省博物馆）上缴的，据《故宫已迭书籍书画目录》中所列项目就达100多件，极大地丰富了故宫院藏书画。

同时，郑振铎及时成立专门小组，负责接受、收购流散社会的文物。仅1950年就新收万余件，都交付故宫博物院。

郑振铎还积极向上级建议，号召社会各界向国家贡献文物，他率先垂范。1947年春到1948年冬，为防止珍贵文物流失到国外，郑振铎不惜倾尽家资，甚至负债累累，从上海购得大量陶俑，总计657件，几乎都是代表作和精品。1952年他将这批陶俑全部捐献给国家，入藏故宫博物院，其中国宝级珍品20余件。在他的影响下，全社会掀起了向国家捐献文物的热潮。

（摘自2017年11月16日《人民政协报》）

育形成了苏区干部好作风和伟大的苏区精神。苏维埃政府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伊始，就将反腐败贪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列入议事日程，建立相关制度并发动群众监督，对党政机关中被揭露出来的贪污腐败案件，予以公开曝光和坚决查处。“二苏大会”指出，在财政政策上，“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向着贪污浪费作坚决斗争，过去虽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加倍的用力”。这次大会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法规，建立了审计监督制度。1933年4月至1934年3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先后查处了胜利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铁青、“于都事件”等大案要案，深得人心。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培育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苏区时期涌现出的一大批德才兼备、奋发有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不仅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领导骨干，而且成为新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中坚。中央苏区还造就了一大批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各部委和省市主要领导职务的各级领导干部。当年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不愧为中国共产党藏龙卧虎、精英荟萃的锻造熔炉，不愧为中华民族有识之士和杰出英才的聚集地。

（摘自2019年12月2日《北京日报》）



血与火的淬炼：锻造治国安民的栋梁人才

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的模范带动下，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廉洁奉公教育，并采取有效措施惩治腐败，孕